

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研究综述

洪兆平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研二部,江苏扬州 225007)

摘要: 社会网络在我国的集体行动动员和参与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梳理和分析国内外40多年来有关“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研究现状,重点关注“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联系的”、“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集体行动的参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究竟怎样”等问题,从而展现该领域不断深化的理论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创新研究方法、加快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 社会网络;集体行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D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5)03-0045-07

对于民众的群体性抗争行动,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的概念表述。西方学者一般使用“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革命”、“抗议政治”等词汇,我国学者一般使用“群体性事件”、“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社会冲突”等词汇。尽管以上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但都属于同一范畴。鉴于中国短期内并无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或革命的条件,正在发生的大多是基于利益诉求、并无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撑的“集体行动”^[1-2],同时为了便于与西方学界对接,本文赞同赵鼎新、王国勤二人的建议,使用“集体行动”这一中性词汇作为研究社会矛盾或冲突的统摄性概念。所谓“集体行动”,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任何集体行动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土壤之中。社会网络作为个人或组织存在的环境因素,自然与集体行动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这里所说的“社会网络”,是指由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指个人或组织,即行动者;联结这些“节点”的“边”,是各种各样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经由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还是具有紧密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就被串联起来,聚合成为一种关系网络。与“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资本”,其定义分歧较大。较具权威性的OECD解释为:“能促进团队内外合作的,具有共享的规范、价值观和信

任的人际网络”^[3]。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把社会资本看作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4]。一般而言,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中已被投资或动员、并希望获得回报的社会资源,其内涵和外延都比社会网络小。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思潮激荡,社会矛盾复杂,各类集体行动的数量和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相应地,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与国外存在众多、公开的社会运动组织不同,由于受到政府控制,我国的集体行动更多依赖于传统的、现成的社会网络,并在动员和参与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至今,除了迪阿尼以及他与德拉·波塔合作,分别于2003年、2006年对西方学术成果作过类似的述评外^[5-6],此后学界再无续作。因此,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研究现状,探讨今后研究的方向,重点关注“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联系的”、“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集体行动的参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究竟怎样”,以期增进该领域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18

作者简介:洪兆平(1966—),男,江苏姜堰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一、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力图解释当时广泛兴起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却发现自身在知识准备上严重不足。因为理论界仍然沿袭着以勒庞、布鲁默等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传统,认为集体行动本质上是“社会失序和个人病态的混合体”,也即“崩溃”。但是,那些亲历并同情社会运动的学者却挑战这种理论,他们认为集体行动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是难以进入政体的“挑战者”寻求政体内成员改变政策的多种选择之一^[7]。既然集体行动不是非理性的,那么其参与者、同情者就被学者描绘为具有认知能力和政治技巧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具有关系资源,并置身于广泛的社会组织之中。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关系,成为学者特别是“资源动员论”学者的热门话题。其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

1. 社会网络对个人参与的影响

在最早研究社会网络的学者中,斯诺等指出,社会网络能够解释宗教和政治组织中大部分成员(60%~90%)的加入^[8]。麦克亚当对高成本、高风险、以争取黑人权利为宗旨的“自由之夏”运动进行的研究也说明:参加运动与个人态度不相关,而取决于以下3个因素:个人所归属的组织尤其是政治组织的数量、先前参与集体行动的次数、与申请参加“自由之夏”运动者之间的联系^[9]。

根据同样的思路,学者们进一步发现:潜在参与者与其他人关系的密度、强度及其分布,是更重要的解释变量。桑德尔在研究瑞典禁酒组织的成员加入时提出:小团体内部的社会压力存在于招募过程中。他认为,能够影响一个人是否参加某一集体行动的其他相关人士的数量为5~10人。同时,一个人社会网络中包含的禁酒组织成员越多,其参加禁酒组织的可能性也越大^[10]。关系的强度,也是衡量社会网络的重要指标。一般说,互动次数多、感情强、亲密度高、互惠交换多的就是强关系;反之,就是弱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属、朋友、邻里是强关系,熟人是弱关系。格拉诺威特在其经典论文《弱关系的强度》中提出,“强关系”是支配密切互动网络的“小群体”的基本特征,而“弱关系”则更有助于不同群体和组织之间建立联系^[11]。顾尔德的研究表明,强关系比弱关系对征召结果起着更大的作用^[12]。但利姆运用美国“公民参与研究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只是轻度证实了顾尔德等的结论,却发现:在民间组织中形成的强关系,对抗议参加者的征召是最起作用的;也属于强关系的邻里关系只是在招募社

区积极分子时起作用,对其他类型的活动不起作用^[13]。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人们常常置身于多重社会网络之中,对其集体行动的参与,有些可能起促进作用,有些可能起阻挠作用^[14]。由于存在这种可能性,麦克亚当和鲍尔森试图确定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参与决策的。他们二人的结论从本质上证实了此前学者们的结论,即:集体行动的参与和以前的组织成员身份存在关联。但是,嵌入在一定组织中的联系并不一定预示着参与,即便潜在的参与者与已经参与的人存在强关系时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人们对某一身份的强烈认同,并在与参与者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不论这种关系是私人关系,还是组织关系^[15]。

归根结底,学者们需要研究的是事物背后的机制而不是表面的相关。关于社会网络对个人参与的影响,必须厘清社会网络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社会网络对个人参与集体行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帕希在这方面作了总结性的归纳,她认为社会网络具有3大功能:社会化功能、结构化功能和决策塑造功能。人们之所以参与集体行动,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政治议题具有共同的身份识别,而身份识别主要是由社会网络建立和强化的;因为社会网络使他们定义和重新定义他们的解释框架,再加上个人的过往经历及其他因素,就形成了政治意识,进而导向特定的抗议议题。这种在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早期起“初始配置”作用的过程,就是社会化功能。社会化功能仅仅是不充分的初始条件,如果这时潜在参与者的朋友、熟人已经参加某一集体行动,他们就更倾向于参加该项集体行动。这就是结构化功能。在以上“推力”和“拉力”均存在的情况下,潜在的参与者就面临着“是否参与”的决策了,如何克服参与的“壁垒”?关键群众理论认为,人们在集体行动中的决策,不仅是个人的理性决策(理性主义观点),而且受到其他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影响(结构主义观点)。这就是决策塑造功能^[16]。

2. 社会网络对组织参与的影响

从社会网络对组织参与的影响来研究,主要有一般理论模型和基于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两种方法。

前者以马威尔和奥利弗最为著名。他们的理论建构是从批驳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著名论断开始的。奥尔森认为,只有在小型组织中,当人们能够估计其参与的个人收益时,集体行动才会产生;而在大型组织中,每个人都不可能团队的成功产生显著影响,合作是非理性的,难以形成大型的集体行动。作为

一种替代,马威尔和奥利弗的“关键群众理论”强调了关键群众即组织者的关键作用,因为组织者承担了发动集体行动的成本,而不必考虑组织规模的大小;此外,由于组织者运用了社会网络的特性,从众效应在组织的集权和集体行动之间发挥了作用^[17]。那么,“关键群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森托拉从博弈论的角度,通过复杂的数学推导,发展出一个理论模型,回答了大型集体行动的“启动问题”。他指出,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同质性以及当地联盟的形成等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使得人们可以理性地、内生地形成“关键群众”。其中,密集的社会网络及其同质性是“关键群众”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18]。

基于系统的角度来解释集体行动的动力,同样证明了社会网络对组织参与的重大影响。一些学者强调,社会网络使得人们可以计算他们行动的结果。例如,基姆和比尔曼认为社会网络发挥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人们可能响应与他们有社会联系的人所作出的决策;另一方面,由于与他人有联系,人们会评估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影响^[19]。顾尔德则强调了集体行为结果中“公平准则”的重要。人们一般不愿当“出头鸟”,但只要有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其他人就可能“模仿”,因为仅仅“加了微薄之力”。集体行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过程,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决策^[20]。

第三种理论是“门槛”模型。格拉诺威特提出,人们的集体行动不仅依赖于个体人的参与或不参与两种选择,还依赖于其他人作何选择后的成本收益比较。关键概念“门槛”,是指在给定的行动者做出某种决策之前,其他人也必须做出同样决策的数量或比例;换言之,这是一个净收益开始大于净成本的“拐点”。大于这个“拐点”后,集体行动中的“链式反应”就会产生^[21]。但是,如何估算集体行动这种公共物品不断变化的边际投资收益呢?梅西根据“学习理论”,放松了基于行动者理性的严格假设,从而更易于进行结构分析。他通过计算机模拟证明了“门槛效应”是解决大型集体行动协调问题的关键:当个人的行动取决于其他人的参与时,这种决策的非独立性就需要从不合作均衡转向合作均衡^[22]。刘吉(Liu Ji)等通过建立含有“门槛学习”和集体行动的动态门槛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具有异质性代理人的拓扑结构中集体行动的扩散机理^[23]。

在基于案例的实证分析方面,顾尔德最早探索了集体行动绩效与网络变量之间的关系。他根据社区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来解释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不同社区的抵抗力。他假设,如果巴黎公社的自卫队营是按照邻里关系编排在同一个单位,街

坊邻里之间的沟通将产生模仿效应,使他们更能面对损失,从而组织针对凡尔赛政府军更强的抵抗。结果发现,不同社区的抵抗强度不仅与非关系的性质(社区的财富水平、工人阶级的比例、中产阶级的比例)相关,而且与关系变量相关。两个社区之间的联系越强,其抵抗力就越相似;持续的动员和遣散都受到网络性质的影响^[24]。

3. 社会网络的重叠与变迁

前文从个人、组织两个层面讨论了社会网络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但我们还需要了解集体行动的积极分子是如何与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又是如何为成员创造联结的。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些特定的积极分子,其角色类似于“社会搅拌者”,他们在与其有关系的社区和个人之间游走,使集体行动在更广泛的地区出现,接近宏观、微观之间的动员^[25],也即中国人所称的“串联”。此外,通过与几个组织联系、光顾某些场所(咖啡馆、书店等),个人也能产生和复制非正式而密集的交流网络。这些都有助于维持集体身份,即使在集体行动处于潜伏期、不对当局构成挑战时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网络为集体行动提供了“自由空间”^[26]。

另一些研究强调人们的多重角色身份,成为信息、资源、经验的交流渠道。柯蒂斯等把个体的积极分子视作组织之间联结的桥梁,是集体行动“组织场域”的基本结构特征^[27]。组织成员的多重参与似乎受到组织性质的影响,麦克弗森通过调查美国的志愿者协会成员后发现,大型组织不仅能确保其成员较长时间的忠诚,而且经由成员的重叠关系,维持与其他组织的联系^[28]。观察个人同时具备不同的身份、从而联结不同的组织,为我们分析集体行动的环境结构提供了有用的视角。这种方法也可用来观察处理某一特定问题或共享某一身份的组织。例如,妇女组织与环境组织之间就有广泛的共同议题:妇女、环境、人权、发展、同性恋,因此被称为“新社会运动”^[29]。

与以往将社会网络作为外生变量以及大多进行静态比较不同,近10多年来有关社会网络变迁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即: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把社会网络的动态演进视为个人策略性行动的结果。这种网络变迁和由此产生的网络动态也被整合到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之中^[30]。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网络(尤其是封闭和密集的网络)能促进集体行动,其逻辑前提是:存在一种“调节性的利益”来迫使一个人贡献于集体行动,因为网络中的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信息,或拥有奖惩权^[31]。但是,如果社会网络仅仅是个人实现目标的手段,社会网

络可能就是“双刃剑”,人们既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抵制同伴的压力,这又涉及博弈论的问题。一些学者研究策略性网络形成中的博弈,并假定在合作情境下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的价值^[32];另一些学者则使用“向后看”的结构学习模型,解释个体人如何强化从中得益的关系、放弃从中受损的关系^[33]。

布扣依将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建立为一个“连续统一体”模型。从左到右“组织化程度”依次递减。最左侧是社会运动组织联盟,最右侧是就是本文讨论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间为基于组织、个人和网络的协调机构,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各种动员结构进行了完整的归纳^[34]。

二、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

由于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人际关系”在我国具有跨阶级、跨阶层的特殊意义,因此,凡事讲究“人脉”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都无一例外地运用了社会网络来进行动员。

最早注意到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关系的是海外从事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汉学家。如孔飞力、谢诺、裴宜理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捻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分析。

国内学界对“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真正着手研究,是21世纪才开始的事情。特别是一些有海外学习背景的学者,沿用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概念体系、分析框架、写作风格,发表了一批成果,形成了理论热潮。其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一般理论研究

冯仕政根据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分析“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与参与集体抗争兴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入职渠道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高、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也越强。其中“与下级同事的交往”就属于“社会网络”。作者认为,如果仅限于工作关系,与领导的交往属于“弱关系”,那么参与抗争时对领导的歉疚和恐惧感就不强烈;与平级同事的交往也属于“弱关系”,团结感、认同感和效能感不如理论预测那么强烈,亦难以驱动个人参与抗争。因此,为更加准确地评估社会网络对集体参与抗争的影响,需要同时考虑网络的密度、方向和性质^[35]。曾鹏重点研究社会网络的功能,提出社会网络通过情感培育、意义建构、理性计算,影响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36]。张继亮认为社会资本通过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惩罚违诺

者,增进了人际信任,从而助推集体行动,因此奥尔森的担忧是能够解决的^[37]。更值得称道的是,赵鼎新、谢岳、冯仕政相继出版著作,在其中开辟专题,介绍和评述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国外研究成果,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普及发挥了重大作用^[38-40]。

2. 农村集体行动与社会网络

我国的很多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所描绘的“乡土社会”特色,是以家族、地缘、宗族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因此,童志锋指出,农村与日常社会网络相联系的集体行动动员结构,能够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41]。王国勤选取处于同一制度空间(政治机会结构)、发生在林镇的3起群体性事件,更为细致地说明了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的暴力程度成反比,即:在基层“行政社会”里,社会网络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高,集体行动越倾向于常规或非暴力化;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低,集体行动越倾向于破坏或暴力^[42]。于建嵘则揭示了1998年左右湖南省H县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中动员网络的演进路线:代表队伍→网络联盟→筹建农会→集体认同^[43]。从文中可见,实际上当地农民不堪税费的重压,在维护中央“减负”的名义下,已经形成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抗争性组织。

农村的环境维权行动,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高恩新利用发生在Z省的一个环境维权案例,发现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人员动员和集体行动约束;纵向关系网络有助于资源动员,但也对集体行动的策略产生约束;而地方性市场网络(实际应为农村集市,属于空间网络)为集体行动的扩散提供了支持结构^[44]。有趣的是,同样以此案例为样本,邓燕华等在《中国的关系型镇压:运用社会网络来进行抗议的遣散》中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发生群体性事件后,经常调查抗议积极分子的社会关系,组织“工作队”来做亲戚、朋友、同乡的思想工作,要求抗议者退出抗议事件,如果“工作队”的效果不好,可能面临停发工资、调离岗位等处罚。“软镇压”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当地政府对“工作队”有足够的控制力、“工作队”成员与抗议者有“强关系”时,此法才能奏效。该文同时指出,虽然经由关系网络进行的遣散不可能彻底终结抗议行动,但通过减少紧张情绪,可以限制抗议的时长和范围^[45]。严格来说,当地政府发明的这些“土办法”,类似于古代的“连坐”,存在道义和法律上的风险。

3. 城市集体行动与社会网络

我国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单位制,可以替

代西方国家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为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创造可能。李怀以地处我国西北偏僻地区的一家拥有2万多职工及家属的军工企业职工维权行动为例,说明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空间中长期工作和居住,人们的同质性强,发展出了邻里网络、业缘网络和亲缘网络。这些基于空间的社会网络,能够产生利益认同,及时传递信息,具有奖惩功能,从而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条件^[46]。与之相似,杨正喜的研究表明,即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港台地区、日本、韩国的企业主故意增加工人的流动性、并将来自不同区域的工人安排在一个宿舍,使工人原子化,但仍然不能阻止工人们借助宿舍等公共空间形成的非正式网络,发起大型的集体行动^[47]。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李超海,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参加企业同乡会的农民工要比不参加的具有更多的参与集体行动次数^[48]。

关于城市居民的环境维权及其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更是这方面研究的重点。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维权行动不同,市民阶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其在社会网络的运用上有着显著的特色。石发勇对A市N区一个跨阶层居住的街区持续十年的环保运动进行“过程追踪”,详细剖析了包含不同单位和职业的业主以街区为单元的集体行动;其构成的横向网络是动员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因素,包括信访体系、精英人士、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纵向网络则更能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群众领袖在此基础上,利用威权主义国家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利益的“差异”,最终依靠高层权威对基层政府的不法行为进行纠正^[49]。石发勇的研究解释了威权主义国家的基层民众,如何运用社会网络获得集体行动成功的一种可能的路径,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但是,各种社会网络的运用无不服从于高层的权威,一定程度上仍然没有超越“通过大官反对小官”的历史窠臼。冯仕政发现,在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大多数城镇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都选择沉默。为此,他通过实证研究显示:一个人社会地位越高、社会网络越大、关系网络的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越高。他认为,这是由于在差序格局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由社会网络所支配和调用的资源不同。作者不用“社会资本”、而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来解释结果,是因为“社会资本”理论存在内在的矛盾。尤其是从“行动者本位”关注的是“私”,从“共同体本位”关注的是“公”,在社会资本学者看来都属于“社会资本”,违反了逻辑上的排中律^[50]。应当说,冯仕政的探索是

可贵的,与赵鼎新对社会学领域内各种“资本”理论的质疑相呼应,表明了一个学者的独立批判精神。

冯仕政还和美国加州大学的苏阳合作,撰写的论文《适应还是呼吁:中国的阶级、关系和抗议倾向》主要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在遭遇不公事件时,会依据他们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是选择找关系(文中叫“适应”),还是选择抗议(文中叫“呼吁”)?这是两种互斥的倾向。作者假设,找关系会分散人们的抗议意愿,因为拥有关系网络的人会提升他们的阶级地位,而不会抗议。结果,基于全国城镇居民调查的实证研究推翻了作者的假设,那些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低阶层人士不仅倾向于“适应”,也倾向于“抗议”。“适应”与“呼吁”的二分法,是借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的思路,其中一种倾向增加,另一种倾向就会减少。这种假设在中国并不适用,对有关系的人而言,既有可能“找关系”,也有可能抗议。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有“关系”的人一是可能得到内部人士的消息,增加抗议的成功率;二是更可能逃避政府的处罚^[51]。文章验证了西方理论家长期坚持的观点,即:社会网络能促进抗议的产生;同时,文章也揭示了社会网络在中国公私领域的渗透,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预示着中国由人治向法治过渡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

三、未来研究的展望

以上作者仅就目力所及,对40多年来中西方有关“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主要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中可见,学者们对此领域的开拓用力甚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形成了几点共识:

第一,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个人参与集体行动。个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的非正式关系,有助于他与其他人形成共同的身份识别,增进彼此之间的团结,从而可以替代社会运动组织,导向进一步的集体行动。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网络仅仅是怨恨与集体行动之间的中介,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要演变为集体行动还需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

第二,社会网络“催化”了大型集体行动。社会网络所产生的“从众(模仿)效应”和“门槛效应”、相应的奖惩机制以及由组织者承担成本等特点,克服了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的理性计算,能够推进大型集体行动的发生。

第三,社会网络更易建立跨组织的联系。社会网络广泛分布于各种群体之中,有很强的交叉重叠性,这种非正式关系,便于人们进行跨组织的动员。

例如西方的宗教、中国的秘密会社只要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经由社会网络的连接,就会在集体行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西方的咖啡馆和书店,中国的茶馆、宿舍、社区和集市等公共场所,可以被看作空间网络,也为隶属于不同组织的人们发起集体行动提供了方便。

但客观而言,今后学界仍应在以下方面着力突破:

1. 拓展研究范围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集体行动的参与,这属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如同阶级、民族等外在结构因素并不必然导致集体行动一样,社会网络也是本来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事物,只是被人们借用为集体行动的一种动员结构。而信仰、利益、情感等内在情境因素才是触发集体行动的根本动因。因此,有必要在“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参与”的研究中加入“文化维度”,才能更加全面地解释人们的身份认同或“共识动员”问题。另外,抗议的组织者或领袖也不应忽视,他们的知识、经验甚至个人魅力,他们对运动的组织和宣传作用,甚至他们对社会网络的娴熟运用都应进一步开展研究。这样,才能对集体行动有更完整的理解。

2. 创新研究方法

学者们在该领域中大量使用案例研究、基于某一事件或地区的实证分析方法,但是由于民族、时间、议题、参与类型的不同,很容易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比如,强关系、弱关系到底哪一个在集体行动动员中起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在同样的社会网络结构下为何有人参与、有人不参与,其因果关系究竟如何?尽管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是累积知识的基础,是科学的方法,但学者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建立一个解释性更强的理论体系。

3. 加快本土化进程

目前在“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参与”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大量使用的是来自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即:在中国情境下,验证西方学术成果的有效性,并做出必要的修正。例如,冯仕政、石发勇、王国勤等业已进行的积极探索。第二步则应当是立足我国丰厚的本土资源,提炼、概括出新的概念、理论、方法,从而为该领域的繁荣贡献出中国学者的智慧。尽管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但只要坚持不懈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最终一定会有所收获!

参考文献:

[1]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6: 2-6.

- [2] 王国勤. “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9): 31-35.
- [3] OECD. What is social capital? [J/OL]. [2015-01-10]. <http://www.oecd.org/insights/37966934.pdf>.
- [4]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8.
- [5] DIANI M. Introduction: social movements, contentious ac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from metaphor to substance”? [J]. Social Movements & Networks, 2003: 1-19.
- [6] DELLA Porta, MARIO Diani. Individuals, networks and participation [M].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114-134.
- [7] CHARLES T.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62.
- [8] DAVID A Snow, LOUIS A Zurcher, et al.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0, 45(5): 787-801.
- [9] MCADAM D. Recruitment to high 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 92(1): 64-90.
- [10] SANDELL. Organizational life aboard the moving bandwagons: a network analysis of dropouts from a swedish temperance organization 1896-1937 [J]. Acta Sociologica, 1999, 42(1): 3-15.
- [11]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12] GOULD R V. Why do networks matter? rationalist and structuralist interpretations [C]//DIANI M, MCADAM D. Social Movements & Net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33-257.
- [13] LIM C.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do networks matter? [J]. Social Forces, 2008, 87(2): 961-982.
- [14] KITTS J A. Mobilizing in black boxes: social networks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J]. Mobilization, 2000(5): 241-257.
- [15] MCADAM D, PAULSEN R.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 640-667.
- [16] PASSY F. Social networks matter: but how? [C] // DIANI M, MCADAM D.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49.
- [17] MARWELL G, OLIVER P. The critical mass in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9-101.
- [18] CENTOLA D M. Homophily, networks, and critical mass: solving the start-up problem in large group collective action [J]. Rationality & Society, 2013, 25(1): 3-40.

- [19] KIM H, BEARMAN P S.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1):70-93.
- [20] ROGER V G. Collective a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3, 58(2):182-196.
- [21] GRANOVETTER M S.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8, 83(6):1420-1443.
- [22] MACY M W. Chains of cooperation: threshold effects in collective ac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6):730-747.
- [23] LIU J, HASSANPOUR N, TATIKONDA S, et al. Dynamic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social networks[C]// Decision and Control (CDC), 2012 IEEE 51st Annual Conference on. IEEE, 2012:3991-3996.
- [24] GOULD R V. 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1871[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6):716-729.
- [25] HEDSTRÖM P, SANDELL R, STERN C. Mesolevel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6(1):145-172.
- [26] POLLETTA F. "Free spaces" in collective action[J]. Theory & Society, 1999, 28(1):1-38.
- [27] CURTIS R L, ZURCHER L A. Stable resources of protest movements: the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 [J]. Social Forces, 1973, 52:53-61.
- [28] MCPHERSON M. An ecology of affilia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4):519-532.
- [29] HANSPETER K. Local mobilization for the people's petition of the dutch peace movement [C]// KLANDERMANS B, KRIESI H, TARROW 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Greenwich, CT: JAI, 1995:41-82.
- [30] ULE A. Exclusion and cooperation in networks [R]. Amsterdam: Tinbergen Institute, 2005.
- [31] HECKATHORN D D. Collective sanc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prisoner's dilemma norm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3):535-562.
- [32] SNIJDERS, BAERVELDT. A multilevel network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delinquent behavior on friendship evolution [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2010, 27(2):123-151.
- [33] MACY M W, KITTS J A, BENARD S. Polarization in dynamic networks: a hopfield model of emergent structure [C]// BREIGER R, CARLEY K, PATTISON P. 30 Dynamic Social Network Modeling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3:162-173.
- [34] KLANDERMANS P D P G, BOEKKOOI M E. Mobilizing protest: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ers on who participates and why [D]. PhD diss., VU-University, 2012.
- [35] 冯仕政. "大力支持, 积极参与": 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 [J]. 学海, 2007(5):40-50.
- [36] 曾鹏. 群体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 [J]. 浙江学刊, 2009(1):196-199.
- [37] 张继亮. 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资本逻辑理路探析 [J]. 学术交流, 2012(6):45-49.
- [38]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39] 谢岳. 抗议政治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 [40] 冯仕政.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41] 童志锋. 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J]. 理论月刊, 2012(5):169-173.
- [42] 王国勤. 社会网络视野下的集体行动: 以林镇群体性事件为例 [J]. 开放时代, 2011(2):102-115.
- [43] 于建嵘. 抗争性政治: 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80-100.
- [44] 高恩新. 社会关系网络与集体维权行动: 以 Z 省 H 镇的环境维权行动为例 [J]. 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0(1):93-99.
- [45] DENG Y H, O'BRIEN K J.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 [J]. China Quarterly, 2012, 215(215):533-552.
- [46] 李怀. 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维权行动的建构 [J]. 广东社会科学, 2009(6):158-164.
- [47] 杨正喜.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J]. 社会科学, 2012(7):79-88.
- [48] 李超海. 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及集体行动参加次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6):45-53.
- [49] 石发勇.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 [J]. 学海, 2005(3):76-88.
- [50] 冯仕政. 沉默的大多数与环境抗争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1):122-132.
- [51] SU Y, FENG S Z. Adapt or voice: class, guanxi, and protest propensity in China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3, 72(1):45-67.

